

毒品生产与传播的深层社会动因

胡金野

(兰州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由于种种原因, 尤其在我国, 对毒品问题是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还是非常薄弱的。毒品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的生产与传播迄今未能得到遏制, 关键是由于导致其在不同地区生产和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未能得到深刻地认识和根本的改变。只有通过采取生物和社会综合分析的方法, 即将临床医学和社会理论、人的生物本能与历史和社会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这一社会事实, 并进而从根本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

关键词: 毒品; 生产与传播; 社会经济; 社会政治; 社会文化

“毒品”, 虽是一种能致人成瘾的物质, 但首先是一种药品。对这种药品使用“不当”, 或者是“误服”, 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吸毒者及为了吸毒或贩毒铤而走险导致犯罪之人, 这就是毒品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由于种种原因, 尤其在我国, 对毒品问题是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还是非常薄弱的。笔者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毒品重新在我国泛滥, 虽经多年来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却仍是愈演愈烈, 特别是其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的生产与传播迄今未能得到遏制, 重要的并不仅仅在于因为这些“药品”的成瘾性原因, 而是由于导致其在不同地区生产和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未能得到深刻地认识和根本的改变。能否正视毒品生产与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 改变或纠正造成其蔓延的社会环境, 无疑是关系到能否有效遏制毒品生产与传播的核心问题。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毒品生产与传播长期存在的动因之一

经济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经济发展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毒品生产的出现及长期存在, 全世界几大毒源地的出现,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 自“二战”以后逐步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南贫北富”问题, 同样适用于国际毒品问题。即世界毒品生产中心和重要的毒品生产基地基本上集中在贫穷的地处赤道以南的发展中国家, 而毒品却主要流向了积聚财富越来越多的地处赤道以北的发达国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是世界毒品问题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世界主要毒源地的状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地处北纬的“金三角”已经有200多年罂粟种植的历史。“金三角”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 高山深壑、丛林密布的自然条件, 落后的经济文化医疗条件, 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的封闭状态, 是造成这一地区普遍种植毒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其封闭性上看, 这里几乎没有最基本的公路交通, 对外往来十分不便, 居住在该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与外部世界长期处于隔绝状态, 贫穷和落后可想而知。从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来看, 这里除了种植一些旱稻、芋头、瓜豆以维持生计之外, 换取现金最佳的作物选择就是罂粟^①。在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因素的约束下, 种植罂粟成为该地区山民的唯一可能的选择。于是, 长期以来在这一片广大地区, 毒品的生产和流通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产业结构模式^②。

地处中亚的阿富汗与伊朗、巴基斯坦三国交界处的“金新月”, 是一片贫瘠而多山的荒野, 这里气候干燥, 传统的农作物小麦、大麦、玉米很难种植。自1979年前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以来, 经过20多年的战乱, 其经济民生已经是凋零至极。自首都喀布尔以下, 所有的大小城镇以及村庄均变成了一片废墟, 人民生活陷入了一个极悲惨的境地。一些无以为生的农民, 早在苏军入侵时, 便开始在边境山区种植罂粟, 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终于在1999年创下了年生产鸦片4600吨的世界新记录, 使阿富汗这个人均年收入只有三百多美元、世界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 在20世纪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毒品生产输出国。

毒品的传播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息息相关的。

任何一种物质不论是被人类认识发现后而使用的, 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制作出来的, 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和发展, 自然会在社会交往中得到传播。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 传播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样式, 也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主要、最深层和最复杂的现象之一。毒品的传播亦在遵循这一规律, 既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 又需要销售者和使用者两个市场(卖方和买方)的交易作为载体。从时间的维度上看, 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有的在人类社会已存在和传播了几千年。从空间的维度看, 毒品已渗透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卖方市场看, “黑网(鸦片)白魔(海洛因、冰毒)”等已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遍布全球的贩毒网络已基本形成; 从买方市场看,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吸毒人口已超过2亿人, 每年的毒品交易总额已达到近10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仅从买方和卖方两个市场便可看出, 毒品的传播, 即交易受着经济利益的驱使, 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例如, 拉美国家的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遭受国际市场上咖啡、砂糖、棉花、小麦等产品价格下跌、需求波动的打击, 与此同时, 毒品需求却在扩大, 价格上升, 他们纷纷转而种植古柯等高价经济作物, 以求摆脱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而毒品出口使拉美国家缓解了由于农作物和矿产价格下跌造成外汇减少的困境, 这对于负有沉重外债又急需外汇输血的拉美国家来说,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③。如果不彻底改变国际经济关系的这种失衡的秩序, 毒品泛滥的经济土壤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二、社会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毒品生产与传播存在和延续的根源之一

当前世界四大毒源地的出现与长期存在, 也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或者与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有着直接关系, 或者是政局动荡、霸权主义的产物。东南亚的“金三角”是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杰出的作品”, 英国殖民主义者手把手地教会了这一地区山民种植罂粟的技术, 免费为山民提供罂粟种子, 精心地使罂粟种植和鸦片制造业成为这些贫困山区唯一的支柱产业, 也成为英国重商主义者轰开中国、印度等庞大市场的商品“大炮”和滚滚而来的财源^④。“金新月”地区毒品生产基地的出现是20世纪中叶以来美苏争霸推行强权政治, 导致这里战事频仍、民族冲突、恐怖活动不断, 使这一地区政治控制力减弱成为一个三不管、三管又难管的地区。终致迅速发展成一个“毒品新兴产地”^⑤。90年代初, 在“金新月”一侧升起的“金月牙”毒源地是伴随阿富汗十余年的内战、民族冲突和前苏联的解体之后, 使这一地区失去法律和秩序的控制, 极大刺激了毒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⑥。

在我国广大农村, 经济改革一方面使农村原来的隐性劳动力剩余问题突显出来, 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对现金的需求急剧增长, 基本生活用品和诸如种籽、化肥、农药和饲料等基本

(下转第43页)

收稿日期: 2006-12-28

作者简介: 胡金野(1958-), 男, 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禁毒史和禁毒文化与法律。

的主体。”^{[2] (P.180)} 这种肯定人的主体性的观念启示我们,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人用神来庇护自己的无知与无助,也用神来承载自己的欲望与追求。中国的宗教正是以关注人为中心,最终目的是人在现世的幸福。而反观现今社会上的“法轮功”,李洪志自比为神,使“法轮功”信徒对他顶礼膜拜,甘受驱使,直至为他去送死。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热爱生命的宗旨。因此,我们必须铲除这种泯灭人的主体性的邪教,以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的稳定。

其次,康德肯定了人是目的。他认为,在这个目的秩序中,人(与他一起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亦即他永远不能追求某个人(甚至不能被上帝)单纯用作手段而不是在此同时自身又是目的,所以我们人格中的人性对我们来说本身必定是神圣的。^{[2] (P.180)} 康德对人是目的的判断,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国家是不能发展壮大的。我国目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以人为本作为其本质和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并且这种科学发展观坚持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又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成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

再次,康德肯定了理性的重要性。认为理性和信仰都是需要的,超出实践理性的信仰,只能是盲目的不可信的。这种实践理性推动道德律的主体在相信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追求至善。这种理性判断告诉我们,只有理性才能把宗教的神圣性与救世性结合起来,始终坚守博爱群生,利他为善的健康方向,促进道德,有益人民。只有理性才能够理解和尊重其他的宗教信仰,避免宗教成为民族对抗和侵略压迫的工具。只有理性才能使宗教在保持基本教义不变的前提下,不断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提倡在人间体悟宗教,更注重对社会的奉献。此外,我国各级党政干部也应理

性对待宗教问题,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宗教整体上有全面客观的把握,对宗教积极和消极作用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创造宗教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以促进宗教和谐。

最后,康德对基督教的《圣经》进行了重新解释以符合他的道德宗教,此刻的上帝已经不是传统宗教中的上帝,它不是一种外在的他律形式,而是一种自律。康德吸取了基督教中合理因素建立了自己的理性宗教,这种方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借鉴意义。没有宗教和谐,就没有社会和谐,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提出了实现“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谐、文明和谐、世界和平”的“新六和”理念。此外,道教提倡贵生,敬重生命,关爱自然,主张天人和谐;伊斯兰教有对人友善宽容,当行则行,行止有度的“中道”思想;基督教具有爱上帝,同时要“爱人如己”的基本精神。这些理念的正确阐释和宣传,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不仅有助于宗教自身的稳定和谐,而且有助于宗教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和谐。

参考文献:

- [1] [德]海德格尔/孙周兴译.路标[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
- [2] [德]康德/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3] [德]康德/李秋零编译.康德论上帝与宗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4] 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5] [美]J·M·肯尼迪.东方宗教与哲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于宝莹]

(上接第38页)

生产资料都需要用钱来购买。原有医疗制度的改变,中小学免费教育的结束,使农村居民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大大增加。耕地面积少、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增长、农产品尤其是传统的粮食和畜牧产品价格下降,使农民难以靠农业收入来维持生活。农民的现金收入更多的依赖于城镇非农业经济。由于历史上和迄今为止的结构性原因所造成的农民资金和技能的缺失,使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调整和适应的能力受到巨大制约。虽然近20年来我国城镇非农业经济发展飞速,劳动力需求大大增加,但面对数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各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加上在市场经济下,城镇就业市场要受到国际、国内市场波动的巨大影响,致使许多流入城镇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收入极不稳定,生活缺乏保障。这些政治经济因素都使他们比城镇人口更容易铤而走险,从事有可能危害社会的“非法”活动^①。于是,为了尽快脱贫致富许多人都选择了偷种罂粟或偷运毒品为生,并且是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和“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之势,真可谓屡禁不止,屡打不绝。

三、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是毒品生产与传播长期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早在3000多年前,安第斯山区的古印第安人就开始种植古柯,土著居民嚼食古柯叶以御寒、充饥、提神以及治疗胃病、风湿病、头疼等疾病。当地人视其为“圣草”,称之为“绿色的金子”。可以说,古柯的种植是伴随着印地安人的发展而沿袭下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像中国的“茶文化”一样,古柯文化,已经成为了1000万南美土著居民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作为世界三大毒源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的各族人民对罂粟的看法完全与城市里的居民不一样,在他们眼里罂粟与其它农作物没有什么两样,“鸦片”是他们的生计,是他们必需的作物,是他们全家衣食得瞻的唯一可靠收入^③。谈起鸦片,那些来自“金三角”的人们始终都没有半点顾忌,眼睛里根本没有一点负罪感,好像他们不是在谈论遭世人指责的毒品,而是在谈论大白菜的好坏,或者几个孩子在山坡上放牛时说着漫无边际的闲话。甚至还认为罂粟的经济价值高于其他作物,从比较生产成本的角度上看,种植罂粟更合算,因此他们对种植罂粟并没有什么罪恶感,罂粟是“理所当然”的传统经济作物。

土耳其在1972年以前,有近9万户农业家庭的生计依赖于罂粟,鸦片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鸦片是极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它所有的部分都可以利用。由于不会腐烂,它也被作为财富积聚的一种方式;农民家庭每年都留下一定量的鸦片用来积攒作为儿子娶亲时的聘礼,还有的家庭储藏它以备病灾,把它当作未知的医疗费用的准备金^④。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观念或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能能用军队进剿、炸弹轰击、火器喷烧等人力的力量所改变。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注入,要想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状

况恐怕是十分困难的^⑤。

综上所述,无论是毒品的生产,还是毒品的传播均表明,它们与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和人类历史上曾经遭受过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危害一样,毒品生产与传播的发生既有生物学原因,也有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的制成或合成,是以解除病痛造福人类开始的,这样的初衷是无可指摘的。在交通运输、信息传播技术急速高度发展,全球时空急剧压缩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世界各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变化极大地影响着毒品生产与传播的地域分布、传播途径和方式。如在毒品生产的地域分布上,在20世纪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输出地的“金三角”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后,其在毒品王国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已被取代,但仍是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但已从生产鸦片、海洛因发展成生产海洛因、冰毒并存的双重毒源地。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金新月”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于1999年创下了生产鸦片4600吨的记录,而取代了“金三角”成为新霸主。在20世纪末才崭露头角的海上“冰”山——“银新月”是以日本为源头,包括了韩国、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制造和走私冰毒为主“新兴毒源地”。

大量事实证明,要阻止毒品生产和传播的蔓延扩散,不仅要探讨其发生的生物背景,更要关注其得以产生、蔓延,造成某些地区高吸毒率和高传播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在我国,作为毒品主要受害者的常常是生活在毒品流通通道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如城镇无业人员、农村流动人口、少数民族、青少年等,他们不单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事实上,作为社会人,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着其生活于斯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制约的,包括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主义、民族歧视、不同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等等的制约^⑥。只有通过采取生物和社会综合分析的方法,即将临床医学和社会理论、人的生物本能与历史和社会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这一社会事实,并进而从根本上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

注释:

- ①④ 贺晓东,方明.中国禁毒大视角[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②③⑥ 贺晓东,方明.中国禁毒大视角[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⑤⑪ 齐磊,胡金野.中国禁毒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 ⑦⑫ 翁乃群.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J].社会学研究,2003,(5).
- ⑧ 余定宇,王慕卓.远离我——罂粟花的自由[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 ⑨⑩ [美]马丁·布思.鸦片史[M].海南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陈丽氏]